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 主编 黄达

分报告三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定位

刘晓路 郭庆旺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 主编 黄达

分报告三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定位

刘晓路 郭庆旺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定位/刘晓路, 郭庆旺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黄达主编)

ISBN 978 7 300-08609-5

I. 全…

II. ①刘…②郭…

III. 财政政策-研究-中国

IV. F8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7409 号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主编 黄达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定位

刘晓路 郭庆旺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28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15.5 插页 1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97 000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报告将全球经济调整进一步扩展和提升到涵盖面更广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调整”视角，通过对全球社会经济调整逻辑的梳理及其对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影响，得出需求不足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社会结构失调将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长期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结论。基于这种基本判断，本报告坚持认为，需要通过政府因素及其职能的重新调整来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与社会结构失衡互为表里的深层矛盾，并以此为基本依据对中国的财政政策进行重新定位。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 (03JZD0013)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
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首席专家：黄达

课题组成员：陈 共 陈雨露 吴晓求
杨瑞龙 郭庆旺 张 杰

策划编辑 王克方
责任编辑 商晓辉
封面设计 李亚莉
版式设计 赵星华

目 录

第 1 章 导论	1
1.1 主题	1
1.2 研究方法	4
1.3 基本内容.....	14
第 2 章 大调整理论	16
2.1 从共同体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调整.....	18
2.2 典型的大调整过程:英国的历史经验	20
2.3 三阶段大调整的经济影响.....	29
2.4 拓展了的二元发展观.....	37
第 3 章 大调整理论与全球经济调整	42
3.1 世界政治长周期.....	42
3.2 全球经济市场化大调整.....	47
3.3 在大调整中崛起:和平还是“威胁”?	55
3.4 结语.....	62
第 4 章 大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	64
4.1 几种主要的经济增长观点.....	64
4.2 中国进入需求不足的时代.....	71

4.3	大调整中扭曲的“熊彼特式增长”	80
4.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政府职能转变为先	86
第5章	大调整与政府职能转变	93
5.1	政府职能转变与国家意志	93
5.2	政府职能转变与民主进程	99
5.3	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分权	104
第6章	经济和谐增长与财政政策定位	117
6.1	经济增长模式:向和谐增长转变	119
6.2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财政政策	126
6.3	配合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财政政策	131
6.4	转变企业创新方向的财政政策	134
6.5	大调整期财政政策的复杂性	138
第7章	大调整中的社会保障制度	141
7.1	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42
7.2	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55
7.3	保障主体的多样性	158
第8章	大调整中的人力资本投资	165
8.1	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层次性	165
8.2	政府投资人力资本的方式	172
8.3	人力资本投资的财政政策选择	180
第9章	大调整中的政府融资结构	199
9.1	政府融资格局的演变	199
9.2	国债作为政府融资格局转换的桥梁	209
9.3	利用和控制国债规模的政策建议	213
	参考文献	217

第 1 章 导 论

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效果与一国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源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现代财政政策理论，普遍流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界、政界和商界；而自 1998 年以来，财政政策一词在中国也已是“家喻户晓”。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结束，我们对财政政策的认识似乎是清晰的、明确的甚至是准确的，但其实还是有些“混沌”。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对解决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重大问题的财政政策定位进行跨越历史的长期思考。

1.1 主题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全球经济调整。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生的变革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逐渐消失，经济转型迅速展开；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不下 30 个国家的确发生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局面。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全世界对于市场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方面的基础作用达成了普遍共识。这一重大变化，清楚地反映在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种种调整上。

从国家内部层面看，努力使市场在本国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不

仅仅是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专利（尽管它们在转轨过程中所作的调整是最剧烈的）。巴西和印度等使用计划手段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实施了以经济自由化为中心的经济改革。英国和瑞典等西北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出于对国有经济低效率的不满，或是由于不堪福利体系的重负，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也不断通过改革，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

从国家之间层面上看，全球市场的规模骤然增大了许多，仅从人口数量上看就增加了大约一倍。20 世纪 80 年代后，自由贸易秩序从 OECD 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和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形成了贸易保护程度远低于以前时代的全球贸易体制。与此同时，全球金融活动飞速增长，逐渐向一个统一的全球资本市场发展。特别突出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增长超过了世界收入增长速度和贸易增长速度。全球贸易与金融的发展，推动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弱化了企业的国籍身份，从而使得“国际化”逐渐被“全球化”所取代。这使得国家在干预国际经济事务时，尽量避免对市场秩序产生过分的干扰，以免对从全世界谋取利润的跨国公司产生不良的影响。

面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调整，各国的经济表现喜忧参半。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明显好于以往时期，如中国、美国、英国和印度；有些国家则出现了持续的经济衰退，如日本和俄罗斯。而分别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两次金融危机，则严重打击了拉美和东亚两个此前发展势头良好的地区。显然，全球经济调整并非雨露均沾的恩惠，应对不当，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危害。

单就 GDP 而言，中国无疑是这一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的一个赢家，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的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从 1998 年前后开始的内需不足，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敲响了警钟。通货紧缩久治不愈，直到 2003 年底才出现转机。但即便如此，国内商品绝大多数供过于求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说明内需不足的压力始终还是存在。2003 年底经济状况的好转，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出口的迅速增长。但在国际贸易领域，我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摩擦不断，并转化成了关于人民币是否应当

升值的国际政治争论。这些征兆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调整为我国经济增长留下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未来中国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如何在内需不足与外需不稳定的情况下保证宏观经济体系的稳定？

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的子项目之一——全球经济调整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定位，不仅要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理清中国长期持续经济增长凭借什么得以实现且这种增长与全球经济调整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还要从特定的全球经济调整格局和特定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出发，回答中国政府在保障长期可持续增长过程中应当将什么作为中长期追求的中介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财政政策如何定位这两个问题。这其中没有哪个问题是容易回答的。近些年，已经有了许多国内与国际的学术文献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但往往是分散的，观点、角度、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本研究不打算把重点放在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上。我们的目的是找到一个视角，建立一个框架，从而能够在这个框架中对全球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定位三个问题进行全面连贯的分析。

一个视角——大调整理论。我们这里所谓的“大调整”是指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由此引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变。这与我们目前流行的说法——转型有些接近，但又有所不同。国内常见的转型观，往往将其理解为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或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秦晓，2006）。国外所用的“transition”一词，一般指的是冷战后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经历的变化，其含义更多是政治性的，往往谈的就是从共产主义到民主资本主义的道路选择（Holmes，1996）。

一个框架——由大调整的阶段性而产生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影响。我们指出，社会利益格局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转变，而是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发生大调整的国家所面对的政治经济挑战都各不相同。将这一三阶段大调整理论与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理论相结合，能较好地说明发生大调整的国家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则可以提供一个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模式的解释；据此看待我国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为讨论政府职能转变中涉及的价值

判断（是否应推进民主与分权）提供了分析基础。

一个定位——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应定为促进经济的和谐增长。我们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经济、社会与行政的不和谐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大调整第一阶段引发的系统性现象，与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不能消除这些不和谐，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为此，应将改善收入分配、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促进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因而也是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1.2 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本研究希冀提供一种全面和连贯的分析，为达到这一目的，方法论的一致性是不可或缺的。以下分别对本项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论问题作一简要阐述。

1.2.1 发展理念与历史比较分析

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诞生以来，学者们一直在采用一种可称为发展理念（developmental ideas）的研究方法。它被应用得如此普遍，以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无需特别详述。这种方法的核心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发展范式”（developmental paradigm），即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在同样的变化轨迹上运动，依次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其二是“侧向看历史”（reading history sideways），即认为虽然每个社会都经历同样的发展范式，但发展的速度不同，因此在某个特定的时点，各个社会所处的社会阶段是不同的，那些处于较低阶段的社会恰恰是那些处于较高阶段的社会此前历史的代表，所以使用同一时代的横截面数据，也能描述历史。这种研究方法的力量在于，它既能说明在同一个时代的世界各国间为何存在巨大差异，又为世界本质上的统一留下了足够的空间。^①而在政策实践领域，它导致处于不发达地位的国家以发达国家的社会状况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以推动本国加速超越当前的发展阶段，进入更高的发展

① 更详细的阐述，请参见 Thornton（2005）。

阶段。

只是在最近 20 年中,国际学术界中才出现了对这种发展理念的反思与批判。这种思维定式,倾向于将世界上的各类人群、文化和社会简单地划分为若干个层级,某些社会因此被看做是比其他社会更先进(发达、现代)的,相应的,某些社会被看做是落后(不发达、传统)的,必须作出艰苦的努力,在各个方面积极向先进的国家靠拢。在现实中,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整个世界都向由西欧国家发展出来的生活、社会、政治、经济模式转化。这方面的实践活动,自英国的“日不落帝国”时代就已开始,中间一度被冷战的阵营划分所打断,但从冷战结束后,又混杂在全球化等思潮中,成为一种对政策制定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

发展理念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有体现,尽管不同的领域会主张不同的发展阶段模式。这些模式的正确与否,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检验。但发展理念的危害性在于,它往往诱使人们不经过具体分析而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譬如,如果我们认可美国是世界上军事、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国家,那么能够产生出这种力量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就是最先进的制度,其他国家要想变得强大,也必须引入这些制度;如果引入的制度与本国原有的制度产生了冲突,就简单地认为这是为了实现进步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种推理是不符合现实的,日本的经济、社会制度,就和英美大相径庭。我国的改革实践,也已见证了盲目引入一种制度所产生的恶果,例如自 1994 年税制改革后就屡禁不止的增值税发票造假问题。^①

讨论大调整问题,很难跳过发展理念,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府要介入这种大调整过程。事实上,本研究就提出了一种发展阶段论。但也正因为如此,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的大调整观的性质,希望尽可能避免发展理念容易形成的那种误导。

首先,我们提出的大调整理论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并非每个国家走上市场经济道路都会经历这种大调整。它之所以能够应用于中国,是因为与英国、德国和日本的比较分析使我们认为,中国具备了这

^① 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见杨斌(2004, 73~89 页)。

种大调整所需的条件。

其次，阐述这种大调整观的目的不是要预言未来，从而将某个国家的制度定为中国的目标模式，而是希望发现那种驱动大调整过程的主导力量，以及大调整可能遭遇的风险，从而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利用这种力量和规避可能的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我们提出的三阶段大调整理论，建立在历史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具体来说，就是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状况与 15 世纪以来英国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时间跨度非常大的比较，起因是认为国内学术界常见的一种比较方式不能令人满意。

1998 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现象。这对于过去饱受“短缺”之苦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件新事物，但在世界历史上，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周而复始地发生了许多次。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用很大篇幅讨论的“经济危机”，就是严重需求不足的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在与之进行了多年的斗争后，摸索出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政府干预手段，因此自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代之后，这些国家尽管不时地经历着衰退，但都不曾达到危机的程度。这解释了为什么当我国 1998 年出现需求不足时，经济学者们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同时在报刊杂志上出现了许多将“积极财政政策”与“罗斯福新政”相联系的文章。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大调整期的我国的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相当长时间的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制度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如果这种可比性不存在，那么简单应用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就如同是给儿童服用成人剂量的药物，尽管疾病的症状是相似的，但治疗的后果却可能是灾难性的。又好比是在比例尺不同的地图上画出长短相同的一条线，其实际意义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在做类比前，首先需要完成统一“度量衡”的任务，也就是构造出一种理论尺度，使得中国的需求不足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需求不足现象间的相似与差别能够得以衡量。

为此，我们决定构造一个进行比较的理论尺度。为了确定该尺度的起

止点，规定了它应当符合的三个条件：第一，起止点之间必须具有内在联系，反映某种变化发展过程，正如尺子描述了距离的从无到有，温度计显示了温度由低到高一样；第二，起止点必须具有一般性，西方国家与我国同样适用，也就是说我们所要进行比较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需求不足现象都能被包括在起止点之中；第三，由于进行比较的对象在历史上可能相距甚远，因此尺度本身原则上不应包含那些明显由时间造成差异的因素，比如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果这三个条件得不到满足，比较就无法进行。据此，再结合马克斯·韦伯对“共同体经济”和“市场经济”所作的区分，我们得到了一个由共同体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转变的三阶段大调整模型。而英国作为第一个实现了这种大调整的国家，最符合我们进行比较的需要。

比较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重述英国历史的过程，哪些史实重要，哪些不重要，这必然会引起大量争论。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在方法论上的立场有两个重点。

第一，我们认为历史不完全是客观的、不变的。历史是站在现在回望过去，描述那条由过去到现在的轨迹，随着现在的改变，过去也在改变。从认识的角度说，没有人会记录下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它们会在脑海中留有印象，但这些印象是零乱的、分离的，不会指向任何特定的结论，因此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历史范畴。那么历史什么时候出现呢？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出现。当人们在现实中遇到问题时，会很自然地过去的经验中寻求规律性的因素，此时那些印象就被有意识的分类组织了起来，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有意义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特伽说“历史学……就是有关现状的一门科学”（伽赛特，2002，第438页）。因此我们对历史有针对性的分析，也是以有助于解决当前现实中的困难为前提的。

第二，我们赞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观点，否定之否定是自然、历史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第2章对英国历史的回顾，是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使用的逻辑的一个应用。正如原始土地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否定，而私有制又将被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再次否定。我们认为社会的利益关系也经历着类似的过程：它的萌

芽如何从公共利益的形式中产生,继而发展到对私人利益的强调,又如何在当前“国家干预”、“福利社会”的实践中显示出一种新的公共利益的形式。

1.2.2 政治经济学与财政职能理论

就中国当前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economics)无疑是显学,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备受冷落也有目共睹。这里面有必然的因素,也有不那么必然的原因。但就财政学(public finance)而言,由于与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决定了真正恰当的研究方法只能是政治经济学。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值得分析研究的。

两个多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被重视的程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期的经济学家们,也就是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些所谓的古典主义学者,研究的都是“政治经济学”。这方面,亚当·斯密的观点是很典型的,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第四篇一开始就讲到,政治经济学“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显然,这批思想家在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时,认为“政治”与“经济”这两个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但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开始,“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一词所代替,研究的内容被限制在了在稀缺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领域内。在19世纪末,社会科学学科划分趋于细致的背景下,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足为奇。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专业领域,仅仅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必要在彼此之间划出界线。不过在经过一个世纪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社会科学诸学科间的融合越来越明显,似乎显示出某种分而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经济学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经济学家雄心勃勃地想把经济动机的普遍适用性推广到对所有社会行为的解释中。也就是把那些原本被认为是外生的、因而属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对象的因素和变量,转化成经济学研究的内生部分。这种努力的一个后果,就是使“政治经济学”一词又再度流行了起来。不过,这并不是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它强调的并不是政治与经济的紧密依存关系,而是要用经济学发展

出来的一套规范对政治行为进行研究，因而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公共选择、寻租和经济政策的政治制约因素等方面。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对财政学的影响十分巨大，毕竟当前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就只有两种，一种建立在福利经济学之上，为当前国内外的大部分财政学教材所采用，另一种就建立在公共选择理论之上，后者在最近十余年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郭庆旺、赵志耘，2002，第Ⅳ页）。

因此，当我们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时，如果不加区别则很容易引发语义上的分歧。目前至少存在两种政治经济学，一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作为正统进行教授（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有一类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之上、主要体现在新古典制度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中（新政治经济学）。首先，我们看看上述两种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方面的主要区别。

两种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最小单位是不同的。新政治经济学秉承西方经济学的一贯方法论特征，坚持人类行为者的理性行为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个体（生产者、消费者和家庭）是唯一的社会实体，是理性的最佳方案选择者。由于每个人都希望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抽象的理论分析中，不论其生活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如何，人人都是同质的。而由此产生的一个推论就是，由于人都是同质的，因此从长期看，有所区别的各国的社会制度，最终都将统一到同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上来。相应的，也只有一种最合理的财政制度。

对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来说，分析的最小单位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集团或组织，比如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阶级和列宁所表述的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国家。尽管这些集团和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其本身体现出某种独特的行为特性，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例如，资本家本人不一定就是残忍的，但只要他还是资本家阶级的一员，他就不可能不剥削。根据这种方法论，国家不能被看做是个体通过契约所构建的。它有自身的意志，有特定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特定手段，执行着特定的功能。一句话，它也是分析中的一个不可再分单位，重要性绝不比个人这个个体差。由此得到的推论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所塑造的不同国家，有各自前行的独特轨

迹，彼此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趋同趋势。相应的，对一国来说最合理的财政制度，必须与其文化背景和历史相契合。

上述两种政治经济学范式，对应着两种财政学理论体系。一种可以被称作“市场中心观”，以个人交易的场所——市场——作为分析的起点，各种政府行为都围绕着“市场失灵”展开。另一种可以被称作“国家中心观”，以国家执行的特定职能作为分析的起点，以此界定财政如何处理和社会其他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目前我国财政学界在财政职能理论方面流行的“公共需要论”和以往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分别是两种体系的代表。但在当前财政学界的学术研究中，“国家中心观”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不管是从学术争鸣的角度，还是从解释和指导现实的角度，这都是一个巨大的缺失。

首先，缺乏“国家中心观”的视角，造成了理论和现实的脱节。试问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何处不见国家的影响？没有国家的不断调控，目前残缺不全的市场体系根本无法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认为国家仅仅是在弥补市场失灵实在不是客观的态度。国家所做的远比这要多，它实际上是塑造市场的主要力量之一。不理解这种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也无法理解我国市场中出现的种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

其次，缺乏“国家中心观”的视角，导致对国家自身职能变化的忽视。作为塑造市场的力量，国家必然具有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是过去文化背景 and 历史的延伸，而不是从其他国家移植过来的。看看美国、日本和德国，尽管它们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它们的市场制度差异极大，而这种差异的起源只要考察一下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就能得到明白的解释。我国虽然一直在强调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种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充分的讨论，也没有什么一致意见。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注定将持续影响我们民族的未来，但我们对于主导这一变革的国家意志却不加理会。譬如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目标，但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却在向着警戒线的方向不断恶化，这不能不说是目标不明确的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改革的恶果。